

巨星殞落



▲《何索》Herzog, 1964

英國諾丁罕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員
◎蔡明燁

美國作家索爾·貝婁 (Saul Bellow, 1915-2005) 已於今年4月5日撒手人寰，享年89歲。貝婁曾於1976年同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和美國「普立茲獎 (Pulitzer Prizes)」的雙重肯定，堪稱20世紀英語文壇的大師。

◆ 早期作品

貝婁是蘇聯猶太移民的後裔，原姓貝羅夫 (Belov)，全家於1913年由聖彼得堡搬到加拿大後改姓貝婁。索爾·貝婁於1915年6月10日在蒙特立奧附近呱呱墮地，是家裡四個小孩當中最年幼的一個，原名索羅蒙 (Solomon)，隨後改為索爾，8歲那年隨家人偷渡到芝加哥，不過他本來不知道自己是非法移民，直到二次大戰期間等待軍方的徵召時，發現了這段不為人知的始末，這才回頭正式填寫各種所需資料和申請表格。貝婁自抵達芝加哥後就開始學習希伯來文，而希伯來文也成了他一生的志趣之一，不過貝婁坦誠，他從小受到芝加哥街頭生活的洗禮，早已徹底美國化，後來不僅曾在芝加哥大學就讀，畢業後也長期在母校任職，因此他的許多作品都和芝加哥有不解之緣。

二次大戰期間，貝婁曾在美軍貨船上服務，然而他生平只寫過一部戰爭小說《擺蕩的人》*Dangling Man*，1944年出版，藉由日記的形式，敘述一名青年專心等待入伍，因為首度發現自己的生命是受到強大外力的左右，完全超乎個人的控制，不能也不必由自我負責，頓時感受到一種奇妙的自由，是一本與眾不同的戰爭作品。他的第二部小說《受害者》*The Victim* 於1945年問世，描寫一名住在紐約的猶太律師，因為一樁案件導致了一位非猶太朋友遭受解雇，被解雇者忿忿不平，開始向猶太律師採取一連串的索賠行動，使生活原就緊繃的猶太律師幾乎面臨精神崩潰！

這兩部小說都被貝婁自己歸為「習作」，不過誠如《紐約客》*The New Yorker* 雜誌書評人威爾森 (Edmund Wilson) 所指出的，兩部小說主人翁的性格、聲音和思考模式，都成了貝婁將來作品的人物雛型，而貝婁格外注重人物著墨的寫作特色，從《擺蕩的人》和《受害者》即可見一斑，因此當貝婁在1953年更上一層樓，出版了力作《奧吉·瑪琪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時，人物塑造的技

巧已使貝婁被公認為美國小說界的重要作家了。

奧吉·瑪琪的樂觀和無所畏懼，使他成為貝婁筆下眾多角色中最受讀者津津樂道的一位，英國小說家艾米斯（Martin Amis）就曾表示，《奧吉·瑪琪歷險記》結束了他對所謂「大美國小說（great American novel）」的搜尋；也就是說，艾米斯認為奧吉·瑪琪已經為「美國夢（American dream）」提供了最佳的詮釋。

◆ 攀上高峰

貝婁一生著作甚豐，要從中挑出一部登峰造極之作，不同論者看法各異，不過他在1956年發表的中篇小說《抓緊一日》*Seize the Day*無疑備受讚譽，更曾在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推薦辭中被特別點名提及。本書主要描寫一名來自紐約的猶太推銷員如何走向毀滅的過程，和美國戲劇大師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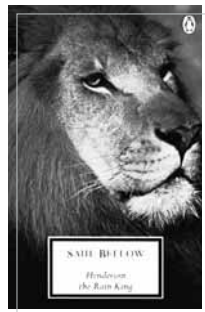
然而貝婁自己最心愛的作品卻是他1959年完成的《雨王韓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故事背景建構在貝婁從未履足的非洲，突顯了他對小說創作和想像力的十足把握，而這本充滿了寓言色彩的喜劇小說也是他最暢銷的著作之一，敘述一名美國百萬富翁如何在非洲的土著部落間找到了自己。

其實，貝婁雖然未曾到過非洲，大學時代他卻曾在芝加哥和西北大學研讀人類學，所以他對非洲土著部落的文化習俗並非一無所知。他筆下的韓德森雖然在物質上擁有了一切，但在精神層次和性靈生活上卻幾近破產，透過韓德森和幾位非洲部落酋長的互動，讀者看到了一個具有強烈物慾又自戀的現代人如何受到心靈的淨化，進而逐漸蛻變成一個充滿愛心的英雄。

至於他在1964年出版的《何索》*Herzog*，則顯然是貝婁最出名的小說之一，評價極高，有人甚至認為此乃貝婁最偉大的傑作。《何索》可以說是一部處理中年危機的作品，以幽默、詼諧的手法創造了一個小丑般的都市知識份子，雖是歐洲小說中常見的人物典型，對美國小說而言卻屬罕見。何索過著非常美國化的生活——匆忙的旅程、飛行、車禍、夜生活、槍械問題、人欺欺人……等，但貝婁在何索的日常生活中點綴了許多令人驚喜的小人物，竟使何索的平凡人生引領美國小說走進了一個嶄新的天地，很有喬哀斯（James Joyce）不朽名著《尤里西斯》*Ulysses*的味道！《何索》曾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暢銷書排行榜上蟬連了一年，在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和丹·布朗（Dan Brown）等快節奏推理小說充斥暢銷書市的今天，很難想像類似何索這種專門喜歡在腦海



▲ 《抓緊一日》
Seize the Day,
1956



▲ 《雨王韓德森》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1959



裡和伏泰爾（Voltaire）及盧梭（Rousseau）等大師對話的小說人物，是否仍能引起今日讀者的強烈共鳴？

無可諱言，《何索》和貝婁其他的作品一樣，都帶有很深的自傳性色彩——如同何索一團糟的私生活，貝婁曾經歷過四次失敗的婚姻和無數婚外情，他和子女的關係也不和諧，當他在1989年和第五任妻子結婚時，曾因兩人將近半世紀的年齡差距而成爲社會新聞，而當他以84歲高齡再次當上爸爸時，更曾激發各種媒體的議論紛紛！雖然較爲厚道者嘗論這是貝婁旺盛創造力的另一展現，但既然作家的私生活動見觀瞻，讀者也就可以想見貝婁所面臨的是怎樣的一種社會和生活壓力了！

此外，《何索》書中的芝加哥風情，也反映了貝婁本人和芝加哥的關係。自從大學畢業之後，貝婁曾先後在明尼蘇達與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但從1963年起，貝婁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永久聘約，從此芝大的海德公園（Hyde Park）就成了貝婁心目中的文化綠洲，當作家描寫何索如何徘徊於海德公園並沉思於密西根湖畔之際，讀者很自然也便可以想像貝婁自己所留下的足跡……。不過何索發現，高等教育對備受生活困擾的人來說，並不能真的提供很多實質的幫助，此一主題一再重複於貝婁其他的作品中，或許象徵了作家內心深處的吶喊吧？

◆ 如日中天

在1970年問世的《賽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中，貝婁對生活的迷惘提供了更深刻的描寫。本書背景設於1960年代末期的紐約，賽姆勒先生是一位躲過了納粹摧殘的波蘭猶太人，溫文儒雅又博學多聞，曾與著名的英國科幻小說家威爾斯（H. G. Wells）有過交誼，但自從來到紐約後，新生活使他產生了無所適從之感，進而開始逃避人群，並將全副心神寄託於對月球的探索上，直到幫助賽姆勒先生逃難到紐約的葛拉納（Gruner）去世時，賽姆勒先生的注意力這才赫然由外太空回到了地球，由無情的物質轉到了有情的人世。總括來說，貝婁藉著賽姆勒先生再次點出了他認爲知性生活無力解決人類困頓的無奈。

到了1975年，貝婁出版了《洪堡的禮物》*Humboldt's Gift*，描寫芝加哥作家兼學者希純尼（Charlie Citrine）面臨事業瓶頸，既和前妻法律訴訟不斷，和情婦的關係也糾葛不清，和毒梟之間更發生了重重問題！然而就在這個當口，希純尼聽到了老友洪堡（Von Humboldt Fleisher）客死紐約並留給他一筆遺產的消息……。

如果說希純尼是以貝婁自己爲雛型，那麼洪堡就是貝婁的朋友舒瓦茲（Delmore Schwartz）——一個才華洋溢的瘋狂角色，具有自我毀滅的特質，而貝婁無論是在真實人生或者小說世界裡，似乎都對這種介於天才和瘋子之間的人物典型情有獨鍾！《洪堡的禮物》引人入勝處，在於貝婁對洪堡的描繪——誇張、搞笑、充滿感情，但又具有可信度。其實，《洪堡的禮物》原很容易變成一部喜劇或鬧劇般的小說，不過貝婁之能讓讀者笑中帶淚，進而受到靈魂的洗滌並思考嚴肅的課題，正是他的高超之處。《洪堡的禮物》在翌年摘下美國「普立茲獎」，貝婁也

於同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

諾貝爾和普立茲的兩頂桂冠是貝婁事業的巔峰，不過聲望和財富不但為貝婁製造了不少敵人，也使他覺得自己更要寫出擲地有聲的文字，因此1976年之後，貝婁的文風丕變，政治觀也開始走向偏激，許多貝婁後期的作品都曾引發不少爭議，例如他在1976年完成的非小說文集《耶路撒冷來回》*To Jerusalem and Back*，及今觀之，似乎便呈現了對以色列問題的一種一廂情願式的盲目樂觀；他在1982年推出的小說《院長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假主人翁之口對芝加哥的腐敗和羅馬尼亞的官僚體系施以諸般抨擊；1987年的《死於心碎》*More Die of Heartbreak*，直陳許多現代人將自己今天的過失歸罪於不幸的童年，在他看來只不過是一種搪塞責任的藉口！此外，他對種族歧視、現代科技、政治正確、教育制度，以及其他當代作家的表現……等，也都各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支持者或稱不落俗套，反對者或謂充滿偏見，端看你由哪個角度來衡量。

◆ 蓋棺論定

雖然我們可以將1976年視為貝婁寫作生涯的分水嶺，晚期的貝婁仍不斷有新作出現，即使成績已不再如先前那麼耀眼，大師之作終究不容小覷，除了上述提及的幾本之外，還包括1987年的短篇小說集《他與他的笨拙》*Him with His Foot in His Mouth*、1989年的兩本中篇小說《竊案》*A Theft* 與《貝拉羅莎關聯》*The Bellarosa Connection*、1991年的《好讓你記得我：三個故事》*Something to Remember Me by: Three Tales*、2000年的《拉維斯坦》*Ravelstein*，以及2001年出版的《故事集》*Collected Stories* 等。

其中《拉維斯坦》是貝婁的最後一部創作小說，引起過頗大的迴響，因為本書很明顯地以貝婁好友布倫姆(Allan Bloom)為主角。布倫姆是政治哲學家，生活多采多姿，晚年公開了他是同性戀的事實，《拉維斯坦》中對他的描述充滿了娛樂效果，但最動人心弦的，卻是同性戀的男主角與異性戀的故事敘述者之間那種自然而深厚的情誼，遺憾的是小說情節過於粗疏，使拉維斯坦無法和先前的何索或洪堡等量齊觀。

貝婁小說對於知性生活的質疑以及對精神危機的探索，使某些論者將他與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相提並論；而他對20世紀美國小說的貢獻，則使部分論者將他與海明威(Hemingway)和福克納(Faulkner)並列為美國現代文學的三大巨擘。不過也有人對貝婁是否能像杜斯妥也夫斯基、海明威及福克納等人一樣永垂不朽，暫抱否定的態度，他們認為貝婁的成就相當於另一位美國當代的重要小說家——阿普岱克(John Updike)，可惜基於瑜亮情結，貝婁和阿普岱克彼此瞧不起，此一論點大概會令兩位作家都覺得相當不痛快吧？

無論如何，貝婁對性靈和物質世界的癡迷、對抽象和現實人生的觀照，以及對人性弱點和優點的嬉笑怒罵，豐富了現代小說的肌理，他的文學地位或許尚有待後人的評價，但說他是美國猶太移民20世紀中期最佳的代言人，相信當不為過。